

前 言

“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自人类作如是说之日起，通向发明货币的道路便打开了。

诚然，最初时期，交易方式均为以货易货；你给我乙物，我给你甲物。不过，这样的讨价还价，必须假定在交易开始之前就对甲物和乙物的价值有一个估价；达此目的最佳办法，起码最通行的办法是根据第三种货物和前两种货物的价值相互比较作出估价，而这第三种货物又需是日常使用的物品。比方说，有些民族习惯用“价值若干头牲口”来表明价格。这样一来，这个“若干头牲口”便在有货币之前含有计算货币的意义了。人们在记忆中对此尚有印象：印度的卢比一词来自梵文 *rupa*，此事绝非出自偶然巧合，我们的形容词 *Pécuniaire*（金钱的）一字便带有拉丁文 *pecus* 的痕迹。当我们步埃斯库罗斯⁽¹⁾的后尘，说某某人“舌上带牛”，意思就是暗讽他被人收买保持沉默；这个暗喻是再明白不过的了。一些别的民族用大麦或稻米，鱼或兽皮作为参照，因此，计

算货币的存在隐藏在交易的概念之中，即便这些交易使用的是最原始的以货易货的方式。

每当此处或彼处，人们用一些譬如贝壳、珍珠或金属锭之类的易于运用或保存的物品来作为定价的参照物时，一个决定性的进步就此完成。这些物品或称“钱币”，确实可以用来进行任何类型的交易，作为某一财物的交换物或者简单地用来支付不足的差额。换言之，这些物品既是计算货币，又是结算货币。自此，任何出售都可以用“钱币”来结清，然后再由卖方把这样收进来的“钱币”使用到其他地方去或者暂存起来，留作日后之需。就空间与时间而言，交易从以货易货方式过渡到另一种范围更为广阔的商业方式。货币再不仅是价值本位，而且也是交换工具与购买力的储备。

然而，这种制度还是有一个缺点：当一个人接受用钱币来支付时，难免冒有危险，他收到的贝壳可能已有损坏，珍珠颗粒比常用的较小，金属锭的重量或成色不足等等。就金属而言，固然每一次交易时可以先行解析过秤，不过这种做法未免过于复杂。为了使人们不至于裹足不前，同时也为了鼓励人们使用钱币结算，政府当局殷勤劝说，告知民众，尽管放心大胆地使用，政府当局也根据约定价值接收钱币作为支付工具，即使该钱币的实际价值低于面值也不妨事。达到

这项目的的最佳办法当然是采用公共行政机关铸造的硬币作为钱币。这种方法更具有吸引力的另一面是：行政机关从铸币中将可获利颇丰，只须它赋予钱币的面值高于钱币本身含金属量的价值便可。

这是主要的一个阶段。所谓历史也者，始于文字。同样地，我们可以认为货币历史始于官家铸造钱币。一段漫长的时期——硬币时期开始了。硬币时期在欧洲一直延续至 16 世纪。让古钱币学家去鉴赏钱币的艺术价值吧！让社会学家去评估钱币的政治与宗教意义吧！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仅致力于叙述货币的经济职能。

很久以后，在 20 世纪中叶，一种新的概念占了上风。根据新概念，货币不再作为一种真实的财物出现，货币庸庸碌碌，继续扮演着它的三种角色：价值本位、交换工具、购买力储备。

此外，由于缺少物质基础，货币也就是它本身的本位，这一时期，我们可以把它归纳入货币本位标记之下，它构成本书第四章的内容。在这里，我们仍然处于纯粹的经济领域里，且让“货币学”专家们去负责研究当前的货币流通方法手段吧！或通过手授受，或通过书面文字，或通过电脑传递。

在此期间，世界成功地于 19 世纪直至 20 世纪（1914 年），把硬币稳定性与货币本位的灵活性结合

起来，这就是金本位制。这一节，我们将在本书第三章探讨。

至于本书第二、四两章，它们将谈及过渡时期的一些情况。这些过渡时期分别为：

——17 与 18 世纪的金本位起源；

——1914 至 1945 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段短暂但异常动荡时期的金本位制的瓦解。

除了这种逻辑的连贯性之外，货币历史进展并非风平浪静，没有争议，没有逆转现象。正如 16 世纪时，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坚持认为，货币一旦消失，人类就得以摆脱无数的不幸。又正如，社会主义理论家们很难接受由国家来担保货币的价值，而货币的职能之一便是使得货币持有者能够累积未来劳动生产权。他们之间某些人曾提议建设一种‘完全没有货币的’新经济，不过在他们取得政权的地方，货币依然继续存在，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可以出现货币荒现象，每逢这种情况出现，便又回到了以货易货的陈旧办法。一些奇异的用语出现，诸如：“交易货币（真是妙不可言的同义选用词，用它来表明一种替换货币。）也可称之为‘一包香烟本位……’不过这一切都是暂短的。不管人们意愿如何，货币应该被认为是任何发达经济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第一章 硬 币

公元前 3000 年，黄金在埃及被用来作为计算货币，而白银（与大麦同时）则流通于美索不达米亚。支付货币尚不存在，交易仍采用原始的以货易货方式。直至公元前 2000 年末期，支付货币方始出现，恰好亚洲的两端，即中国和安纳托利亚。²⁾

中国人只是在较晚的时候才发现冶金术。可是他们，如果敢这样说的话，两口并一口，狼吞虎咽。早在公元前 11 世纪，他们用铜币代替贝壳作为支付手段。铜币的外形奇特，一面平扁，一面凸起，上面刻有文字。这些铜币名称生动有趣，或称“蚁鼻”，或称“犬首”；其后又兴起一些别的形式，有铲形，也有刀形。很久很久以后，在公元前 3 世纪赫赫有名的“铜钱”问世了。这是一种当中有一个方孔的圆形钱币。这种钱币后来在远东一带大受欢迎，持久不衰。

至于在安纳托利亚呢？情况完全不同。公元前 1530 年左右，赫梯人^[3]横扫巴比伦，发现了美索不

达米亚的计算货币。赫梯人大受启发，回到本国之后，动手开采他们的矿藏。他们并没有仅仅满足于使用银希克勒（sicle, 1 希克勒相当于 8.41 克白银）、斯达代尔（statère, 1 斯达代尔相当于 2 希克勒，也就是 16.82 克白银）、米纳（mine, 1 米纳相当于 60 希克勒，或 504.6 克白银）与达朗（talent, 1 达朗相当于 60 米纳，亦即 30,276 克白银）来标明价格，而且直接使用白银来支付大款额的生意。为了便利交易，他们在银锭上盖有印记，清楚地标明了银锭的重量与成色。还有一步尚待跨出：不仅在体积大小不同的银锭上加盖印记，而且还在那些完全一模一样的银锭上也盖有印记。

这一步在公元前 6 世纪跨出了。但不是由赫梯人跨出的，而是由邻近的一个民族，吕底亚人^[4]跨出的。那时，吕底亚人刚刚摆脱了赫梯人的统治。公元前 687—前 650 年间的吕底亚国王吉热斯被普遍认为是西方货币的发明者。事实上，最古老的卵形钱币，用黄金和白银混合铸成，曾在吕底亚的帕克托尔河冲刷夹带下来的天然金属块中被发现。这些古币风采依旧，别的一些钱币几乎紧接着立刻在埃奥尼亚出现，那儿是吕底亚邻近的一个希腊属地；之后，又在阿尔戈斯^[5]与希腊本土相继出现。

公元前 6 世纪时，许多希腊城邦都铸造钱币，在

吕底亚，冶金学家们已经掌握了分离金与银的技术。克雷伊斯国王^[6]创立了一种复本位货币制度。包括一个银斯达代尔（重量减轻到 10.89 克）和一个金斯达代尔，重 8.17 克。1 金斯达代尔可换取 10 枚银斯达代尔。于是，黄金与白银这两种金属的比值便固定在 13.33 与 1 之比（这个比例后来略有演变，或金的价值提高，或银的价值提高）。其后，波斯人战胜了克雷伊斯，发行上面铸有新王大流士头像的金币。名之曰德利克（*darique*）。德利克的重量稍有增加，为 8.41 克。这种做法使得德利克信誉大振，成了希腊与东方交往中名副其实的国际货币。德利克的铸造被认为是王家特权，价值金币二十分之一的银币米底亚·梅蒂克（*sicle médique*）^[7]的铸造权则让给了省总督们。

货币因而有了一个实际值，相当于货币本身所含有的金属量的价值。金属货币这一名词便源于此。不过，公众对于货币的信任可以赋予它们一种高于它们实际值的解除值，高出的差额被称之为“信用”价值。“信用”价值既能补偿国家的提取，必要时也能补偿钱币的不合格。

所谓的提取是这样的：每当冶金部门向铸造工场提供黄金和白银时，作为对原材料的支付，冶金部门收取一定数量的钱币，这些钱币所含金或银的总价值少于他们所提供的原材料金和银的总价值，两

者之间的差额用来抵偿铸币费用及“铸币税”，所谓的“铸币税”，即国家给予自己的好处，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好处是国家收入的重要部分。

不合格钱币可以来自自然耗损或不法克扣。这种现象甚至可能发生在钱币铸造工场内部：原材料本身不能保证钱币重量始终不变。比方说，国家明确规定 1 米纳白银必须切铸出若干斯达代尔，某些斯达代尔重量可能高于平均重量，其他一些则较低；再则，铸造工场人员未必人人是正人君子，以致钱币铸成后往往低于平均重量，而不是略高一些……

“辅币”用来支付零星开支或是补足差额，情况特殊，又当别论。事实上，确实谈不到用贵重金属来铸造辅币。与其铸造时使用一种含金或含银成分少得可怜而合成比例又不十分可靠的合金，还不如直接使用某种普通金属，如铜、铅之类。这下子，辅币的解除价值固然不高，它们的实际价值就更不用提了。这一点正好说明辅币表现出异常突出的信用性质；国家对辅币提取的铸币税相当高。

由于上述种种理由，货币与贵重金属之间的联系远不如人们通常想像的那样刻板僵化。同等重量，同一成色，而不同国家的两种不同货币按照它们受人欢迎的程度不同，可能一种货币比另一种货币更值钱，但也可能价值更低。比如说，某一种货币，

由于它的来源国向国外的购入多于售出或者干脆因为它不能使人们对它产生信任，于是在汇兑市场上贬值了。一旦中间人发现不如熔化已贬值的货币，把金属运到国外去换取其他货币更有好处时，这一货币的贬值下跌便自然立时终止。但是，由于旅途的侥幸性以及对贵重金属运输的种种禁令，这种营业的代价使铸造价和铸币税全部落空，没有着落；换言之，贬值的幅度肯定很大。相反的，当某一种货币呈现涨势时，那就很难说会走到多远了。投机商面前的活动范围是相当广阔的。

在每一个国家里，小小一个事变就会引起货币与金属之间脱节的危险。我们将会看到，每当发生这种情况，几乎都是走向单一发展方向，即：货币疲软。或者钱币面值依然保持不变，但重量减轻了，成色不足了，当然，速度节奏各国之间不同。或者，钱币重量与成色不变，但面值提高，其速度节奏也因国而异。

硬币从希腊与波斯传播到了美索不达米亚，传到了埃及，传到了地中海周围所有的地区。要评估它们在历史上与经济思想方面所起的作用，追踪它们的足迹，是很值得的。且让我们去希腊人和罗马人那儿看看，然后再去中古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浏览浏览。

I. 古希腊国

普鲁塔克^[8]根据当时的叙述（《名人生平》梭伦, XV），谈到公元前 6 世纪初叶，雅典的历史始于一次货币贬值。在梭伦的思想里，问题在于设法减轻贫苦农民对富有地主的负债，允许农民们用分量不足的金属货币支付同等数目的金额。

几十年之后，专制君主希庇亚斯收回流通中的全部钱币，代之以其它钱币，重量仅为旧币的一半。表面上看，这是首次当权执政者用这种办法来解决他国家中的财政问题，但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公元前 5 世纪末，被分配到劳里厄姆含银铅矿去开矿的奴隶们，借着斯巴达人不断入侵的机会，逃离工作岗位，生产因之停顿数年，致使雅典人不得不改铸铜币，铜币远不如银币受人欢迎。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喜剧《蛙儿》第 721 到 726 诗句中说：他奇怪公众居然放弃了使用通行于希腊人与野蛮人所居各地“响当当铸造精良”的古老钱币，而毫不犹豫地使用“昨天或前天铸造的低劣铜币”。其实，要解释这一事实非常简单：假如人们把上好钱币收藏起来，目的无非是为了积攒，而使用低劣的钱币，目的则为了把它们脱手出去阿里斯托芬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发现了后来

人们称之为格雷沙姆⁽⁹⁾法则：劣币斥优币。

不过，说起来这无非是一些波折。每一次，上好钱币总是卷土重来，占了优势。请看：雅典又重新铸造银币，按照梭伦指定的标准规格，每块重 425 克的米纳切铸成 100 枚德拉克马（*drachme*）；由此推算，每一德拉克马平均重 4.25 克。除斯巴达例外，其他所有希腊城邦也全部铸造银币。有些城邦的德拉克马平均含银 4.25 克，和雅典的钱币一样；另一些城邦，一德拉克马重 6.06 克。只不过雅典的硬币铸造十分严格，驰名各地，重量保持不变，含纯银量一般达 985‰，从不低于 966‰。为此，雅典银币在希腊各地极受欢迎，甚至像阿里斯托芬所说的那样，在希腊境外也不例外，特别是币面铸有猫头鹰像的代达拉·德拉克马（相当于 4 德拉克马的银币）逐渐成为地中海东部地区的真正国际货币，再向东去，便由金德利克来接力了。

希腊人也使用铁币，实际值不高。在雅典及其他大部分城邦中，铁只铸造金额微不足道的欧波尔（*obole*），换言之，辅币 1 德拉克马相当于 6 欧波尔）。斯巴达人的钱币则全部用铁铸成。斯巴达人是战士民族，习俗异常严肃刻苦，事实上，他们最讲究的是：对贵重金属的引诱避之不及。钱，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方便（的交易工具，价值本位）他们拒

绝把它看成是一种累积财富的方法，一种财物，它本身值得人们眷恋不舍，简而言之，在斯巴达人眼里，货币一物，除了政治当局所承认的价值之外，不可能有其他价值。直接采用贵重金属只是在国与国的交往中才有存在的理由，因为国与国之间不存在一个共同的政治当局；就是为了这唯一的理由，斯巴达在胜利后才积聚雅典银币。

柏拉图是斯巴达的醉心崇拜者，在理论上走得更远。我们在《法律篇》一书中（V, 742）可以看到：“货币提供给一国公民们支配使用，在他们中间有一定的价值，但在其他的民族中则不然。”只有在境外旅行的人，而且在官方控制下，才允许持有外币或贵重金属；回到本国之后，如有节余，该公民必须交回官方当局，换成相应数量的本国货币。“如果该公民把节余留下自己收存，这笔钱将予以没收，不予检举的同谋者，将与持有这笔不法财物的人同样受到诅咒与耻辱。此外，持有者将另处以罚款，罚款数额将不低于该公民带回国的外币金额。”人们可以说：柏拉图早在 25 个世纪之前就已预先描述了最最现代化的汇兑管理制形式。

亚里士多德之于柏拉图有点像拉辛^[10]之于高乃依^[11]；亚里士多德并不重视叙述应该如何如何，而着重于写述实况如何如何。是他，第一个明白地

提出了货币的三大职能：价值本位、交换工具和购买力储备。在他的《政治学》(I,9)和《尼各马可伦理学》(V,5)两本书中，亚里士多德明显地突出了货币的价值一部分来自事物的本质，一部分来自于政治当局与社会公约。

色诺芬也大声呼吁苏格拉底的传统。但看起来，他似乎对于事物的表面现象比对于内在的思想更为敏感。在他的《雅典的收入》(IV)一书中，对下面这一事实感叹不已：白银不同于其他事物，尤其与黄金不同，尽管人们大量生产白银，但它的价值依然保持不变。事情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既然，从定义上来讲，德拉克马永远与同等重量的白银等值，白银的价值用德拉克马来体现，就始终不变；可是，色诺芬忘记了德拉克马如用购买力来体现，却不断下降。他放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发现货币数量论的机会……

事实上，三个世纪的时期间，银币数量愈来愈多，结果出现了生活费用不断上涨。根据迪梅特里奥斯·德·法兰尔的所见，雅典的物价水平，在公元前第六世纪提高了将近一半 在公元前 480—前 404 年之间翻了一番 公元前 404—前 330 年之间又翻了一番。

四世纪末，充斥希腊境内的是马其顿钱币。菲利浦二世是潘吉金矿的主人，他下令铸造刻印有他

本人头像的金币。其子亚历山大，按照波斯的模式，把真正的复本位制度抬得很高，大占优势。原本，一金德利克值 20 银希克勒，亚历山大下令在他的帝国全境使用斯达代尔，1 金斯达代尔相当于 20 银德拉克马，并决定马其顿·德拉克马与雅典德拉克马没有区别。这样希腊的货币与东方的货币统一了。

公元前 330—前 320 年间，希腊全境物价上涨更为突出；毫无疑问，原因由于亚历山大的士兵在亚洲掠夺贵重金属，大量流入希腊。后来，开始了缓慢的下降趋势。

II. 罗马一览

公元前约 450 年时，雅典文化正大放光芒，罗马的基本十二表法依然规定罚金数目按照牲口头数来计算。尚须近四个世纪之后，罗马人才开始熟悉银币的使用。公元前 269 年，第一家铸币工场方始在卡皮托利山的朱诺女神庙附近开工。当年女神庙里的神鹅曾经报告高卢人入侵在即。为了纪念此次大事，人们送给了女神一个绰号 莫内塔（报警的女人）这个绰号又转用到铸造工场及其产品上，于是出现了一个既普通又极有魅力的名词 穆纳（意即货币）。

不过，公元 3 世纪上半叶，货币一般统称为阿埃

斯(aes)。阿埃斯代表青铜，但更普通地代表赤铜合金，那时，因为在罗马使用得最多的钱币（法国人名之曰：阿斯）是一种小铜锭，重 327 克，也就是说一斤或 12 盎司。阿埃斯蒂玛尔(aestimare) 一字绝非出自偶然的编造……当时，意大利南部属于希腊世界的一部分，为此，使用的是银币；它与迦太基有商业关系，所以有时也使用金币。

待罗马人战胜皮洛士之后，意大利南部归顺罗马。此后，罗马有意铸造金币与银币，实现货币统一。它的士兵掠取了库存贵重金属，使得罗马有条件实现这一计划。显然，公元 3 世纪中叶，与铜阿斯同时又出现了另外两种货币：银德尼安(denier) 和金奥莱玉斯(aureus)。

再说，阿斯的重量迅速下降。起初。可以用赤铜价格上涨一事来解释这一现象。接着，习惯成自然，发生了其他货币重量减轻的现象。此中国家获利不少，公众也乐于接收携带方便的钱币。到了 3 世纪末叶，1 阿斯仅重 1 盎司，因此它的重量只剩下原来的 $1/12$ 。原则上，解除值是不变的：永远保持 10 阿斯足够换取 1 德尼安，但是，实际值与解除值已不相符合。换言之，阿斯一如欧波儿成了一种辅币，其价值主要由于“信用”。

奥莱玉斯发行量不大，只用来进行大宗交易，从

来就不是日常使用的货币，而且使用时按重量计算，同时还考虑到黄金与白银的市价比例（市价永远是经常变化的）。

最终，还是德尼安与其约币赛斯代尔斯（severce）（四分之一德尼安）构成了罗马货币制度的基础。德尼安的重量最初定为 4.55 克白银（1 斤 72 德尼安），不久，稳定在 3.9 克（1 斤 84 德尼安），接近雅典与马其顿两种德尼安的价值，自然而然地，它取代了后两种货币，成为地中海地区的主要国际货币。请想一想，犹太的 30 德尼安那一段叙事吧！

罗马共和国将度过两百年的货币稳定时期，除了铜币确有走向衰退没落的趋势之外，别无其他变动。公元前 140 年，阿斯的解除值略有下降，原本 1 阿斯相当十分之一德尼安，此时成了 1/16 德尼安。公元一世纪中叶，阿斯的实际价值几度减少，最终币重降到 1 盎司的四分之一，甚至八分之一。

到了奥古斯都大帝王朝，金币与银币的铸造成为了皇帝的一种特权。奥古斯都借此机会将在埃及截获的大量贵重金属投入流通领域。他决定 1 金币的重量此后为 7.8 克（1 斤 42 金币），相当于 25 银德尼安。这等于说，1 斤黄金价值 1050 枚德尼安，同等重量的金与银，金价为银价的 12.5 倍。

几十年之后，由于达西金矿的开发，引起了金价下跌，银价随之相对的上升。这种情况本来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理由来加重奥莱玉斯的重量而减轻德尼安的重量。尼禄却相反地因国库亏损，抓住这个借口把金币与银币两种货币重量同时减轻，不过，比例不同。这种做法使他获利颇丰。奥莱玉斯的重量下降到 7.3 克(1 斤 45 奥莱玉斯)；一枚德尼安重仅 3.4 克(1 斤 96 德尼安)，而且成色同时下降 7%。1 奥莱玉斯仍然换取 25 德尼安。1 斤黄金自此价值 1125 德尼安，不过是贬值的德尼安。

尼禄的继承者们轻松愉快地走上同一条道路，一直到 2 世纪末叶，他们始终没有使奥莱玉斯贬值，但却几次削减德尼安的成色，最后，合金中铜的成分仅占一半。银币与青铜币的区别再也分不太清了。就像过去雅典在阿里斯托芬时代一样，公众对新币失去了信任，转而聚集旧币，余留下的流通货币顿感数量不足，渐渐难以满足各省的需求与支付国外进口商品。诚然，求助于银行可以结算各项交易而不必动用钱币，但是，那个时代，银行尚只与为数极有限的客户有接触。硬币荒最终导致商业活动速度放慢，以货易货方式的重新出现多多少少得以抑制住这种现象。如此一来，公元 3 世纪，对帝国来说，是一段危机时期，经济活动停滞，发展缓慢。